

阿思奇 著

宏观论

中国统计出版社

90
P015
55

宏观论

阿思奇 著



中国统计出版社



3 0005 8293 6

(京)新登字 04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宏观论 / 阿思奇著. —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7. 3

ISBN 7-5037-2412-9

I. 宏…

II. 阿…

III. 宏观经济学

IV. F0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3663 号

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北京三里河月坛南街 75 号 100826)

新华书店经销

科伦克三莱印务(北京)有限公司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875 印张 40 万字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前 言

现代科学的世界观，就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范围划分为涨观、宏观、微观、渺观。大部分人比较注意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问题，而研究涨观（即膨胀论研究的世界和宇宙范围的问题）和渺观（即超微观研究的分子、原子、核子以及细胞、基因等问题）的人较少。在经济学中也是如此，研究国家经济、地区、部门、企业、家庭、个人经济问题的较多，研究跨国经济、全球经济的则少些。过去我主要研究宏观问题。但我的研究并不止是宏观经济问题，还涉及社会、经济体制等宏观问题。因此，我把这个论文集广义地叫作“宏观论”。一个国家最基本的问题是经济问题，而我参加工作后最长从事的专业也恰是宏观经济，这就使本书中经济论文的篇章较多。也可以说，本书主要表达我在宏观经济方面的观点。

对于国家来说，宏观经济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全社会都在谈论宏观经济，所有的政府人员都在讲“宏观经济调控”，各种媒体每时每刻都有报导。说明在中国，经济学语言能象政治性语言一样普及开来。但这是否就等于我国的宏观调控搞得很有水平呢？并不尽然。就说“宏观经济”这个术语，大家都在谈论，可是各种职业的人所论道的是不是都是一个概念上的经济问题，就不一定了。我们历来主张实事求是，在学术上的求实，就是严谨治学；在经济工作上的求实，就要搞清工作对象。因此，很需要对宏观经济加强研究，弄清楚宏观经济的运行规律和恰当的调

控方法，并将之用于实际经济工作。

近15年来，我的工作一直是围绕宏观经济运行的，有时做实证分析，有时做政策咨询，为了摸清宏观经济的运行规律，我离开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工作来到国家统计局，从统计数据和国民核算中揣摩经济运行的脉络，受益非浅。现在我想把自己对宏观经济的认识和寻求良性循环的思索整理出来，形成一个包括宏观经济运行轨迹、宏观经济调控模式和调控机制、经济发展和刻画宏观经济态势的方法论等内容的小体系，便于经济工作者参阅。

要在宏观经济这样大的题目下做出出色的工作是不容易的，尽管这样，我还是专心于这件复杂的事。当许多人把自己的证券知识应用于实践时，我仅仅能提倡政府自觉地运用股市和利率轮流促进经济增长和抑制不同的需求；当我国的经济运行不畅的时候，我坚信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当预感到我国的经济将进入高峰或低谷的时候，我总是朝态势相反的方向考虑经济发展和调控的方法。有时候，我们都看到经济运行不尽人意的结局，这对于探寻良性循环的人与其说是苦恼，不如说让人焦急。为了减少经济运行中的不畅，还是需要多研究规律，多总结教训，纵使我也知道这些不成熟的看法再翻腾出来作用是很有有限的。

在一些专家和朋友的鼓励下出版这个集子，我的本意在于总结自己的学习与实践的心得，同时与读者进行交流。在此，谨对给予我多年教益的专家学者和领导同志以及许多企业家们致以衷心的感谢。也请读这本集子的同志多多给予指教。

阿思奇

1997年5月17日

目 录

对一些经济问题的哲学思考	(1)
我国的国民经济循环运行	(18)
经济波动规律及其运用	(35)
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模式	(52)
宏观经济调控的支持系统	(70)
宏观经济调控回顾 与今后的任务	(81)
“双桨”间接调控——避免通货膨胀	(91)
经济工作中的“软调节”措施	(97)
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构成的聚类分析	(108)
经济结构与调整对策	(116)
市场经济中分配领域的宏观调控模式	(133)
国家、集体、个人三者收入分配关系扭曲的症结	(142)
我国城市高消费趋向透视	(152)
投资规模与通货膨胀	(156)
我国潜在通货膨胀知多少	(163)
对通货膨胀的测度	(167)
对通货膨胀的判断和甄别	(175)
用 M2 衡量货币对通胀的压力会误导形势判断	(184)
巨额赤字下的政策选择	(188)
应当重视消费对再生产循环的积极作用	(193)
关于固定资产投资宏观调控的几个问题	(201)

1988年物价形势	
——答《投资与建设》特约记者问	(205)
1988年价格改革的得失	(210)
紧缩货币要注意保持工业的简单再生产	(218)
1990年经济运行与后势展望	(223)
1991年的库存问题	(233)
落实1991投资计划须解决资金来源问题	(241)
1992年经济运行及发展趋势	(248)
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	(256)
1993年经济发展情况及动态	(259)
1994年通货膨胀分析	(265)
1994年货币供给分析	(269)
如何理解1994年经济中的矛盾现象	(280)
对1995年抑制通货膨胀的一些看法	(290)
1995年货币供给分析	(293)
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模式给党中央的报告	(299)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模式应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以 社会所有制为主体、以股份制为实现形式	(301)
股份制在所有制过渡中的承先启后作用及历史局限性	(316)
重温马克思对股份公司中投机行为的告诫	(325)
加快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与现实依据	(328)
对90年代后半期的展望	(355)
中英经济增长比较	(379)
中美德日印五国综合国力比较	(391)
中国社会经济的未来	(408)
宏观经济综合指数的模糊测度	(485)
作者简况与年表	(498)

对一些经济问题的哲学思考

● 1996 年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大发展时期，总的经济形势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与西方国家长期萧条而难于复苏相比，更是举世瞩目和令人叹服。但客观地说，我们也有许多不稳定、不平衡、不健全的问题，严格的说也存在不符合经济规律甚至违背经济规律的现象。这些问题从事物的孤立面是看不到、看不清的，只有联系事物的各个侧面、运用唯物辩证法才能看到、看清并加以解决。

一、诸多经济问题困扰着国家

在我国的经济工作中，搞艰苦奋斗、战天斗地，动员群众大干快上比较容易，因为谁都想早一天过上好日子；搞全国一盘棋、一平二调、精减下马也比较容易，因为我们有党的纪律和军事化的优良传统。但是，搞经济的协调发展就很难，实行统一计划的经济体制没有成功，在改革中运用市场经济手段多了，但一出现大的问题还是常想用老办法去解决，结果也曾使经济发展受到很大影响。从我几年来观察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工作，感到所有这些难以解决的问题，都是带有辩证关系的错综复杂的问题，要解决好关键不在于经验多少、熟悉不熟悉经济情况，而在于怎样理清我们经济工作的头绪，运用哲学观点分析好各种矛盾，采用不同手段加以分类解决。做不到这一点，就会长时间受深层经济问题的困扰。

经常困扰国家的经济问题，不只是表面的供求缺口、通货膨胀、市场疲软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已经是经济关系发生矛盾的结果，更不是哪一个建设项目怎样搞的问题，而是经济生活中的两类深层问题。

第一类深层问题是一些密切关联、不能割裂和对立的矛盾，在经济工作中难以统筹兼顾和协调处理：

1. 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国民经济是一个全局、大局，而地区、部门则是局部，企业、个人就更小。长期以来，局部与全局之间在总体上协调的同时，又存在需要和行动上的矛盾，在政治上一致的基础上又存在经济上的不尽一致的争执，尤其是出现局部与全局、各局部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出现大的不平衡，国家和一些局部环节就吃不住劲了，又要搞一拉平。

2. 宏观与中观、微观。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常注意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和宏观调控，而企业则认为自己是独立的生产经营者，应该有充分的自主权，总被宏观经济管理“调控”处处被动。在宏观与微观之间夹着地区、部门这些中观经济主体，他们的经济行为往往是倾向于微观层次的，因此宏观与微观、中观之间的矛盾时不时就尖锐起来。两者、三者要协调一致不容易，而且常常顾此失彼。

3. 总量与结构。进入工业化建设时期以来，我国就处于总量增长快、结构不平衡的深度矛盾中，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体制改革后还是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方面总量持续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存量加大，调整起来的顾忌也大了，但对市场的调整作用又不放心，对存量调整可能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感到难以承受，而又缺乏增量调整的投入能力。

4. 国有经济与民营、外资经济。我国的经济制度需要保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但在改革中，大力吸收民间和境外的财力搞建设，以弥补国有经济增殖慢的缺陷。但是有了多种经济成分，争论也就多了，最典型的是不同经济成份的竞争是否在“同一起

跑线”。这些争论对政策的影响也很大，为了“救”国有企业，已取消给其他经济的减税优惠，采取市场分割和垄断，搞专营、限价，但国有企业至今还是不活。

5. 生产与消费。生产与消费在经济循环中属于两个不同的环节，本来应该是协调、关联的统一体。但因为两者的主体区别极大，生产者是一大批企业，又担负着向国家纳税的责任，地位比分散的消费者自然高。同时，生产创造财富，而消费消耗财富，在过去生产不足、消费受到制约的长时期形成的单纯生产观念至今还束缚一些人的观念，生产大幅度增长就皆大欢喜，消费增长刚接近生产增长就要控制消费基金（消费基金本指统计上的消费额），生产与消费就为导向的问题尚未定论。

对这些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思考方法去研究，结论往往会有很大差异，处理的结果也是时好时不好。一旦解决不好就会加剧经济力量间的磨擦，降低总体效益。

第二类深层问题是两方面对立着的一些矛盾，统一起来要以一方为主体，另一方为从属，解决不好会造成经济剧烈波动。诸如经济增长的快与慢，某种经济政策的放与收，经济杠杆的上调与下降，资金、财政的紧缩与放松等问题，都存在对立着的两个方面，在不同经济发展时期会有不同的突出问题，而同一种问题在不同时期的突出方面也有所不同，不能简单地套用老经验去处理。

1. 经济增长的快与慢。几乎每一年国家都要告诫各地不要盲目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有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想快也快不了，这使到底经济增长的适度的百分比是多少，成为理论和实际工作的重要议题，其中在增长的能力、增长与投资的弹性、增长速度与经济结构比例是否适应等问题也讨论得十分热烈。

2. 积累与消费。在过去，扩大再生产的主动权掌握在国家手里，而国家发展的重点是重工业，并通过配给制限制农副产品和轻工业产品的消费需求，使积累资料生产得多些；而现在投资主

体增多了，消费资料生产资金周转快，效益好，所以发展速度很快，这时消费率不提高就无法实现许多工业产品的价值，使收入结构和生产结构发生矛盾，限制消费会引起开工率下降，有效的办法应是搞好收入增长再分配和收入使用的调节。

3. 货币政策紧与松。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流通量的增长是很快的，这一方面有经济生活的货币化和经济的实际增长需要较多的货币供给的一面，也有超经济发行、推动物价上涨的一面。在国家已经确立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时候，企业普遍反映资金紧缺，地方领导和国有企业对国家的货币政策能否顺利贯彻也有很大影响。货币的紧与松还要假以利率这一杠杆，对居民的影响也很大。所以，这是一个社会敏感性很强的问题。

二、正确地认识我们所面临的矛盾

对需要协调和统筹兼顾的这类问题，在实际处理时为什么老是相互脱节和顾此失彼？这恐怕与我们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有关。

就拿各地区、各部门的发展需要统筹兼顾来说，经济哲学认为各地区、各部门之间发展不平衡应该是绝对的、一贯的，而发展平衡才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过去我们也常这样讲，可是一出现不平衡就怀疑是否搞错了。事实上，我国各地区之间的相对水平的差距是在缩小的，只是绝对水平的差距较大，而且经过经济体制、特别是财政体制的改革，财税、价格制度已不再是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了。而发展快的地区对国家财政的贡献越来越多，国家能够用这些财力通过再分配的间接手段增加对不发达地区的追加投入，调节地区间的发展速度，促使不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相反，倘若限制条件较好的地区的发展，就是限制国家经济实力的加强，就要削弱国家的再分配能力，这种作法连资本主义国家都不用，我们这样说、这样做就是平均主义思想作祟。部门之间的平衡问题在理论上是较易于解决的，只是在实际工作中，不可

能作到同时间、等比例发展，需要运用市场信号和不同的投资步骤逐步走向平衡，必要时也只能轮流重点解决，在这方面，急于平衡也是无益的。

再拿宏观与微观这种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经济来说，人们经常将其对立起来，似乎为了顾全宏观大局就要牺牲微观“小局”，照顾了微观就会影响宏观稳定，这就把两者的关系搞错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是两种不同层次的经济活动，它们的运行主体也不同，调节手段应该有所区别。一般来说，宏观经济不好，微观经济必然受到影响，而微观经济问题多，宏观经济也不会好。微观经济主要是依据市场规律运行的，如果出问题也往往是局部的。微观主体之间有一种竞争和制约的关系，此消而彼长，出现微观问题只能针对性地解决，而不能搞“一刀切”。宏观经济主要受国家经济政策影响，它的问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一部分微观经济过度膨胀，引发全面的经济过热的宏观问题，如1992年的房地产热引起生产资料大幅度涨价和资金紧张，致使生产资料价格猛涨，直接融资盛行，金融秩序、进口秩序混乱；二是宏观调控搞得不好引起自乱的宏观问题，如1988年放开消费品价格，搞价格“闯关”，而又未采取稳定货币的利率措施和价格放开中的“控”、“管”，继而又搞全面紧缩，结果由全面过热急剧转人全而疲软，出现了滞胀，同样也给国民经济带来巨大损失。

还有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也不能对立起来，而必须认识到他们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谁离了谁都不行。我查了一些政治经济学著作，过去谈再生产循环，只是一般性的讲生产、消费属于再生产循环的两个环节，互为条件。那时候我国是生产不足，消费受到分配的限制，所以理论上偏重于解决生产问题，如增长问题、两大部类衔接问题。现在我国的生产力发展了，许多生产超过了需求，消费问题对再生产循环的影响增强了，出现了一些用传统理论解释不了的新问题。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中，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很容易认清。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

批判》导言》中明确指出：不仅“生产直接是消费”，在生产过程中要消费生产资料和劳动，没有生产人们也就无从消费；而且“消费直接是生产”，没有消费再生产就失去目的、无法完成，生产及其发展是从消费观念的发展变化中找到方向的。更重要的是，生产和消费的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是各种社会的共同规律，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①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阶段，这种辩证观点的意义更深刻。从消费反映生产关系这一点看，它应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后体现，而有太多的产品消费不充分或积压浪费，则反映不出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从社会主义的消费目的是保证劳动者身心素质的提高和全面发展这一点看，不断增加消费数量、提高质量才能促进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积极性提高；从消费是新一轮再生产的前提条件这一点看，我国经济要又快又好地发展，必须允许消费的适度增长，甚至允许消费在一些方面的超前（如对进口、高档、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注意并顺应消费趋向的发展变化。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寻求经济工作中统筹兼顾的方法，有时处理得好些，有时处理得不尽人意。一方面要进入经济调控的必然王国境界难度较大，另一方面我们处理问题时精神包袱很重，有局限性。在医学上搞“头痛医脚”，可能是辩证施治，但那也要医道高明才行。我们搞经济，不注意理论先行，经验又不多，难免带有盲目性。为了控制企业涨价，却卡住固定资产投资，又减慢了资金循环速度；市场经济中企业自生自灭是正常现象，但我们最怕企业倒闭，社会保障体系一直建立不起来，只能起到保护落后、加剧潜在矛盾的消极作用，正所谓“用力不当”。要解决好这种问题，就要在经济哲学思想树立一个思维准则。

对那些互相对立的，但在一定条件下有能够统一的矛盾，我们只能有所得而有所失，或为两者的统一创造条件。在这些时候不能忘记对具体问题作好具体分析。

^①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94—96页。

例如，社会性的物价上涨与回落是相反的两种运动，既不能绝对地说物价不能上涨，也不能对物价上涨听之任之，对物价上涨的具体原因也要分清。“物以稀为贵”，供给不足、使以货币购买力为代表的需求无法实现，物价必然上涨；供给增长较快，但货币投放过多，存款利率又偏低，对商品市场的压力就大，就会发生涨价、通货膨胀。因此物价上涨不只有一种原因，因而不能一见到物价上涨就紧缩需求。1984年，银行采取了突击放贷、奖励多存多贷的措施，结果存贷差呈喇叭口一样扩大，现金投放超过适度界限，引起1985年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这样的问题在1993年银行违章拆借中表现得也很突出。这种基于货币供给的通货膨胀只能用紧缩货币的办法加以治理。物价上涨还有另一种原因，即政策性的调价，特别是大面积或大幅度的政策性调价，对社会的牵动是很厉害的，会导致一连串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这时如果也采取紧缩货币，不但使企业在需要增加货币以适应成本上升的时候反而减少了货币来源，而且会加大财政补贴的负担，使财政陷入收入增长不足而支出加大较多的严重赤字。同是一个物价上涨问题，却有不同的对立面，这显然是要加以区分和区别对待的。

再如，在三者分配中，居民收入增长的多是好事，但过度向个人倾斜就会侵蚀利润、影响财政，国家和企业的积累能力就受到影响。我国不同时期消费与积累的比例可以不同。在过去，扩大再生产的主动权掌握在国家手里，而国家重点发展重工业，并通过配给制限制消费需求，积累资料就能生产得多些，这种分配体制弊端很多，解决起来要循序渐进，逐步使产品结构、消费、积累结构相适应。而现在投资主体增多了，消费资料生产资金周转快、效益好，所以发展速度很快，这时消费率不提高就无法实现许多工业产品的价值，使收入结构和生产结构发生矛盾。这时限制居民收入增长恐难实现，限制消费会引起定货不足、开工率下降。有效的办法应是搞好收入增长再分配和收入使用的调节。

前者主要是加强个人收入调节税的征收，后者主要是把一部分收入吸纳到银行存款和证券投资上来。这两部分的分额如何分配，还要看经济形势是冷还是热，冷则降低存款利率、引导资金流向投资领域，热则提高利率、引导资金退出投资领域转为存款。我把这种调节叫作资金流向的“双桨调节”。^①可是我们还没有给股票市场一个确定的名份，没有把它纳入判断经济形势的思考范围，就更不要说对这种市场经济的重要杠杆加以利用了。

三、用经济哲学寻找和运用经济规律

我们面对的经济矛盾如此复杂，处理得好与不好有两种情况：一是会不会运用经济规律分析矛盾，二是运用经济规律的解决矛盾的条件具备不具备。

在商品经济中，支配经济运行状态的经济规律主要是价值规律，各种经济主体都是按自己对价值的判断决定自己的行为的。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的国家，也要遵循价值规律办事。

比如，投资规模的控制，很难把握分寸，因此中央出题目，要我们计算投资、信贷规模、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想找到量化的最优界限。我们算了，计划下达了，银行的资金规模卡死了，但结果从民间冒出了大量资金，被投资商用高于存款利率两倍、三倍的代价吸引到房地产上去了。银行资金越紧、“三角债”越多，民间直接融资、“体”外循环就炒的越火。长城公司诈骗案发生后，人们吓了一跳，但惊魂刚定就又炒起来了。这时我们就不得不思忖，论投资能力谁也比不了国家，但国家要紧缩贷款、控制投资，为什么就有那么多人反着干呢？原因恐怕还是利益驱动。中国经济发展到温饱阶段后，人们的基本消费和部分高消费得到满足后，剩余购买力要寻找一个有利的出路。国家存款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存款就会贬值。在这种情况下，民间集资就有广泛的市场，要阻止是很难的。同时我国处于

^① 阿思奇：《“双桨”间接调控 避免通货膨胀》，《现代企业》1995年13期。

发展时期，资金同物资一样都是在再生产循环中扩大地再生产出来的，尽管增长速度高一些，可能还是不能满足客观需要。这种房地产投资扩张反映我国的需求结构出现了一种转折，要堵是堵不住的。当然这个变化会带来两种情况，一是国外资本涌入，二是资金的派生性加强，其结果是会增加进口和发生涨价。这不是短期的现象，应该在计划上顺应这种趋向，如增加建材生产以平抑物价，增加短线物资进口以弥补供给不足，推行住房改革以回收建设资金和税收。这个例子说明价值规律在资金流向上起着支配作用，分析投资的合理界限不能不考虑客观需要，认识全面了，也就不会只想到堵塞投资渠道、紧缩资金供给一种办法了。

再比如，在简单再生产循环中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用到一定时间是需要替换的，替换的频率和替换中技术、质量的变化是随时代而发展的。现代西方的激烈竞争使生产者不断推出技术含量增多、价格也相应提高的替换品，这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进步，另一方面也被迫浪费了一些生产力。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许多积累要在产品生命周期中的扩张期实现，一种产品在使用价值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生命周期越长其直换经济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就越好，而过于追求品质、花色、性能的翻新，就要缩短其生命周期，使这种产品所提供的总积累减少，这会造成极大的浪费。企业积累减少，同时又总是处于建设和开发中，怎么能实现集约化发展呢？可见把产品质量、花色、性能提到过高的位置并不是上策，在宏观上应该提出恰当的竞争口号，再通过价格上的差距用不同档次的产品实现不同层次的需求，使各层次的产销相得益彰。相反的是，我们在指导思想上过分注意产品的高、精、尖、新、花，这就把我们现阶段的经济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搞成一样了，结果在总体上供给还不足的情况下却有着生产者之间激烈的竞争。搞得企业、财政日子都不安稳。这个例子说明不能把追求产品质量、花色、性能绝对化，面应该从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出发，联系成本、投资效益分析消费中的替换问

题。这也要依据经济哲学思想去寻找消费替换与生产效果间关系的规律性，清理简单化、一般化、绝对化的认识。

运用经济规律解决经济矛盾的效果好坏，还要视客观条件如何，主观上认识正确不等于一下子就能解决好，有时要等待条件成熟。

经济运行与战争有一定相似性。在战争中，敌强我弱时，不能硬打硬拼，采用游击战术较好，敌进我退、敌疲我扰、敌退我追、各个击破，等待全面反攻的总胜利；敌我力量均衡，也要在一个战役、一个战斗中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敌弱我强时，更不能掉以轻心，也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以最小的代价取胜。我们的许多领导人是从军事工作转到经济工作上来的，这些丰富的经验浸透着哲学原理，把它们运用到经济工作上十分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物是第二位的因素，正义战争必定胜利，这种胜利借助了一些物质条件，但缺少物质条件难不倒英雄汉；经济工作是物与物、人与物的关系，人是第二位的因素，人与人的生产关系隐含在等价交换、货币交易中之，一文钱就能难倒英雄汉，所以经济工作更注重物质条件。

1958年大跃进，基本建设上得太多，产业结构严重失调，粮食、钢材短缺十分突出，最后不得不停下来搞调整。1988年我国经济再度过热，加上放开价格引起几次抢购风潮，国家大幅度地紧缩投资，结果到1990年经济增长率只有3.9%，许多工业都停下来了。两次经济调整的性质、结果基本一样，人们比较认同，但对这两次经济过热和调整时期我国经济的实际条件却有很大不同这一点很少有人注意到。一是国内供给约束的程度有很大不同，80年代供给的增长是较快的，但由于体制改革中调整了分配关系，使生产结构与分配结构暂时脱节，局部供给跟不上需求，显得经济很热，如果那时不搞放开价格的“闯关”，而是搞价格的调、放、管，还不会有那么强烈的价格上涨。这一点与